中国改革三步走 郑永年 1．分解式改革 2017-10-09 在任何社会，改革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 2017-10-09 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的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的改革。 2017-10-09 中国当时的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 2017-10-11 大爆炸式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这在某些东欧国家是有的，它们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就是强加的，但有些国家则没有，例如苏联和中国，它们的社会、经济和道德秩序，本来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来体现的。 2017-10-11 一个基本思路就是，用经济改革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利用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 2017-10-11 第四，比较有效的改革次序当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 2017-10-11 分解式改革只是说，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把一种改革定位为主体性改革，而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进行，只不过是辅助性的。 2017-10-11 分解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在理论上具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变革，转化成为制度细节和技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 2017-10-12 从分解式观点看，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这样一个过程。 1．经济改革 2017-10-12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主要特点。 2017-10-12 第一，分解式的改革，即先农村改革，再城市改革。 2017-10-12 第二，分权性，即中央政府向地方和企业分权。分权过程也是渐进性的。 2017-10-12 第三，开放性。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这一特征。比起改革的其他方面，开放性最为重要。 2017-10-12 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2017-10-12 对内开放就是国家把各种经济机会开放给各个社会群体。 2017-10-12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导向型经济的转型。 2017-10-12 “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私有化。 2017-10-12 政治方面的变化是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 2．社会改革 2017-10-12 消费社会的建设也可以减少外来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 2017-10-12 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 2．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 2017-10-12 第一，社会改革的难度大。 2017-10-12 第二，既得利益的强大。 2017-10-12 现在的既得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些利益在改革开放早期扮演过积极的改革作用，是克服旧有既得利益的主力。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有能力来挟持改革议程。同时，他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不过有人认为，既得利益之所以能够挟持改革议程是因为执政党和既得利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执政党有没有利益集团化？这需要人们观察 2017-10-12 周瑞金 2017-10-12 第三，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中央权威不断消失。 2017-10-12 第四，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或者共识不强。 2017-10-12 和其他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 2017-10-12 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可能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产生出“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3．顶层设计与改革动力 2017-10-12 改革动力没有被有效转化成为改革政策，这是个重要问题。 2017-10-12 “顶层设计”的需要和前面所讨论的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 2017-10-12 在强人政治时代，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意志比较容易转化成为政策并加以实施。在强人政治之后，领导层的集体政治意志变得非常重要。 2017-10-12 中国尽管反对西方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但在实际执行层面，中央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制衡远较西方强。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官僚既得利益因此有了长足的成长，它们往往各自为政，不听号令。同时，因为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体制的出现，即使最高决策层的权力也变得相当分散化。这容易使得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不改革”现状。 2017-10-12 第一，顶层设计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中央地方关系。 2017-10-12 现在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缺乏动力。改革动力从何而来？首先就要从中央地方关系中寻找。 2017-10-12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 2017-10-12 简单地说，中国的改革往往首先是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到全国。 2017-10-12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是一线政府，政府官员和社会关联度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必须有所创新来应对或者解决问题。作为一线干部，他们了解社会，也不缺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017-10-26 第二，不管一项改革是通过怎样的顶层设计，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就不可能实施下去。改革需要社会的接受度和支持。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很多政策往往是自上而下制定，但往往是只停留在口头和口号上。尤其是当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阻力时，中央政府可说是毫无办法来克服地方阻力。任何改革，没有社会的大多数的支持，就很难超越既得利益，而得以实现。 2017-10-26 第三，顶层设计必须满足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力量已经得到很快的发展。一部分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而跃升为中产阶层之后，就开始萌发政治参与的要求；另外一些仍然处于比较贫穷状态的人，因为等了多年不能脱离贫穷状态，也在逐渐激进化和政治化，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追求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参与的要求，经过顶层设计的政策很难具备高程度的社会合法性。 2017-10-26 第四，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参与可以影响目前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国各地区差异大，中央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地在各个地方实施。这就给地方政府创造了客观条件去实践各种地方改革。在没有社会的监督下，地方官员的改革可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中国体制下，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例如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很多政绩工程，并不是真正为了地方利益，而是做给上面看的。 2017-10-26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随着党内民主的实施，中央层面领导人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但地方仍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制约机制。地方“一把手”腐败和权力滥用，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缺失社会参与的情况下，地方“一把手”大多可以成为“土皇帝”，至于是不是真成为“土皇帝”，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是很不可靠的。因此，要避免地方坐大还必须实现社会的参与。 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2017-10-26 我们的讨论就可以围绕着这个来展开。根据改革三步走的逻辑，社会管理或者更为广义的社会改革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2017-10-26 社会改革的意义，即要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并且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同时又要为未来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准备好制度条件。 1．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 2017-10-30 中共十六大可以说是社会改革的开端。 2017-10-30 在“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下，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的改革。 2017-10-30 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 2017-10-30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动辄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017-10-30 “regime change”这个概念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ime 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 2017-10-30 在学术界，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基本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1）强政府、弱社会；2）强社会、弱政府；3）弱政府、弱社会；4）强政府、强社会。 2017-11-02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 2017-11-02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 2017-11-02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 2017-11-02 政府以各种形式向社会组织“收购”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大趋势。 2017-11-02 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 2017-11-02 公权力 2017-11-02 中国社会暴力的大制度背景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制度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2017-11-02 在发达社会，尤其是先发展社会，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社会和人民赋予的；在中国，国家和政府决定了社会和人民是否能够得到权力，能够得到多大的权力。在后发展中社会，典型的是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等，政府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过程中较之发达社会扮演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也决定了社会的生存空间。 2017-11-02 公权力 2017-11-02 国家垄断暴力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 2017-11-02 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 2．社会改革和中产阶级 2017-11-02 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不和谐的状态和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是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社会条件。当然，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制度基础。 2017-11-02 和谐社会意味着免于社会激烈冲突和暴力的侵扰。这首先需要一个消除冲突和暴力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从国际经验看，这种社会基础最主要的就是要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2017-11-02 社会分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中产阶级规模过小。 2017-11-02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的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2017-11-02 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 2017-11-02 政府在“法律和秩序”的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内在稳定提供制度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内在稳定。 2017-11-02 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 2017-11-02 有恒产者有恒心 2017-11-02 目前的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 2017-11-02 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否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经济改革模式。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可以反思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有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2017-11-02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有声音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2017-11-02 中国会不会进入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跳出这个陷阱的主要标志是培植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因为缺失中产阶级，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类似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 2017-11-03 社会价值观和理想层面上的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弱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2017-11-03 很显然，对中国来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经济改革的意义，就是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达到可持续的发展，使得中国进入中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个转变的关键是要改变国家动员型发展模式。 2017-11-03 二是对于社会和谐的意义，即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GDP主义，而是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才能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才能为可持续的发展打下社会基础。 2017-11-03 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回归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改革驱动模式。 3．分税制的再改革与社会建设 2017-11-03 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健康成长则取决于一个有利于中产阶级的经济结构。 2017-11-04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 2017-11-04 农业税取消掉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卖给开发商，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017-11-04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资方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工资。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动工资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近年来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 4．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公平 2017-11-04 国企改革不仅可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也关系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问题。很显然，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过，近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因为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国企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无助于社会公平和稳定，反过来还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产生造成巨大的冲击。 2017-11-04 其一是国企进入非垄断领域。 2017-11-04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 5．举国体制与赋权社会 2017-11-04 无论是规制型国家（国家对市场进行规制）还是干预型国家（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相互取代。 2017-11-04 一些经济学家形容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中国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 2017-11-04 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 2017-11-04 在东亚其他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以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 2017-11-04 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上面已经讨论过，90年代的“抓大放小”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 2017-11-04 民富才能国强，社会强才能国家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也是亚洲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市场的历史；而一部社会史既是社会发展和扩张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制社会的历史。 2017-11-04 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 2017-11-04 “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 2017-11-04 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要务就是重新达到两者之间的均衡。 六、政治改革及其未来 2017-11-04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又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无论怎样的政治改革，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执政党的改革。因此，我们就必须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政治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模式 2017-11-04 缺少对政治模式的认识也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不能深化的一个主要根源 2017-11-04 当前的客观局面是，有关方面规定了“不能做”的领域，例如不实行西方式民主、西方式三权分立、多党制、联邦主义，等等。在不能确定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不能做”的领域必然越来越大。这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之前的共同特点。政治不思进步的时候，就趋向保守。而保守就是不作为，不做事。不过，症结在于，中国目前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可以说全方位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有些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得到解决，而有些则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要求解决问题，应当探讨的是“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不能正视所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寻找到具有本质性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对中国模式作出一个合理解释。 2017-11-04 “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和“中国模式会如何发展”等经验性问题。 2017-11-04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即开放、竞争和参与。 2017-11-04 开放最重要，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 2017-11-04 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向不同精英群体开放，向不同的利益开放。 2017-11-04 竞争就是竞争人才，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事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 2017-11-04 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 2017-11-04 开放、竞争与参与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竞争就会出现，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竞争就会消失，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 2．传统政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2017-11-04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开放是中国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和其他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不同，中国文明的主题是世俗主义。宗教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exclusive），而世俗文明的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inclusive）。 4．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2017-11-04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它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2017-11-04 三个代表 2017-11-04 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最近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2017-11-04 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即从各个领域，根据综合考核录用人才的制度。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相当高度制度化。 2017-11-04 第一，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 2017-11-04 二是限任制。 2017-11-04 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地方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 2017-11-04 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 2017-11-04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 2017-11-04 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2017-11-04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的中国民主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 5．政治开放性不足的消极后果 2017-11-04 中共十三大实行了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了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 6．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2017-11-04 第一，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着有机联系。 2017-11-04 第二，减少腐败。 2017-11-04 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 2017-11-04 在很大程度上说，在地方层面，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更具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这些形式的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7．基本国家制度的开放 2017-11-04 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等大制度。顾名思义，人大是社会各阶层利益代表机构，而政协是各种利益协商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 2017-11-04 贤人政治，英文为meritocracy，属于中国的传统。西方是democracy。 2017-11-04 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除了容许司法相对独立，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法律即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也是其最有效的武器。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放弃法律。但这并不是说，司法的相对独立就不可能了。统治阶级可以控制立法。如果对一个现存法律不满意，执政党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可以废除法律。当然，执政党也可以根据新的情况来制定新的法律。但法律一旦到位，政治就要止步，要让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来执法。 七、民主化 2017-11-04 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 2017-11-04 如果如某些人所言，民主只是意味着选举，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可以发生民主化的，那就是开放选举。 1．争取优质民主，避免劣质民主 2017-11-04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2017-11-04 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是推动民主大众化的动力，也是大众民主所能生存的物质前提。 2017-11-04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优质民主的关键。 2017-11-04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级发展了，选民就不会因为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而出卖选票。新加坡选举的清廉（没有贿选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所不能比拟的，甚至超越西方民主，这和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有关联的。再如，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较高的教育素质。随着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众的政治理性水平也会越来越高。理性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选民之间的理性互动是优质民主文化的体现。 2017-11-04 其次是法治建设。 2017-11-04 行强制性投票 2017-11-04 从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稳定有序的民主化经验来看，在民主化问题上，中国必须注意到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民主化的限度，二是政治改革的阶段性。 2．泛民主化的弊端 2017-11-04 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John Locke）著有《政府论》，其主题即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基本思想就是，政府必须有个边界，不能集中所有的社会权力。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性的特征。 2017-11-04 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 3．民生经济与优质民主 2017-11-04 优质民主需要牢固的经济基础，是在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民主。就中国而言，要确立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深化经济改革来推动社会改革，其核心是民生经济。 2017-11-04 首先是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展出了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 2017-11-04 其次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 2017-11-04 再次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 2017-11-04 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就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2017-11-04 实现上述三大平衡的关键是要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都是很明显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2017-11-04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 2017-11-04 第二，从经济上看，因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 2017-11-04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 2017-11-04 从民生问题解决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 4．中产阶级与民主的进步 2017-11-04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培植和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从各国经验来看，优质民主的社会结构就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2017-11-04 “全面小康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2017-11-04 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2017-11-04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 2017-11-04 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 2017-11-04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 2017-11-04 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在西方，因为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 2017-11-04 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 2017-11-04 “劳动致富”是整个中国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2017-11-04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2017-11-04 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什么？表明这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而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2017-11-04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 2017-11-04 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 2017-11-04 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 5．简短的结论 2017-11-04 就政治改革来说，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什么、怎么改缺少基本的共识。 2017-11-04 政治改革实际上要回答“中国政治向何处去”这个问题。 2017-11-04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在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中，社会制度建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深化经济制度建设，又要为未来的政治改革作制度准备。在运作良好的民主社会，社会制度是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如果中国在未来某一个阶段能够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制度性的突破，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制度，建设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不仅仅能够避免人们所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能够跳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低度民主陷阱”，从而成为一个民主、富强和公正的社会。 一、改革深，社会稳 2017-11-04 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1．改革的意义和方式 2017-11-04 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还债。前面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体制变化，从大锅饭到流动性劳动力市场，从前依附于国有制企业上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住房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而经济改革本身又没能确立这些方面的社会制度。社会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还有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需要还债。第二，要通过社会改革来深化经济改革，说得更学术一点，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经济怎么增长？现在提出来要建立消费社会。 2017-11-04 建立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 2．国家制度与好的民主 2017-11-04 市场经济创造了财富，社会主义创造了保护社会的机制，这样的情况下，基本国家制度就建设好了。 2017-11-04 非政府组织 2017-11-04 在改革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很重要。但市民力量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主体，而只是起到督促和监督政府、给政府产生压力的作用。任何国家的制度建设都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努力。 3．执政党在改革中的重要责任 2017-11-04 1980年8月18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谈得非常明确。 2017-11-04 比如党政关系，党政关系的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的政党只是选举党 2017-11-04 政治责任制 2017-11-04 现在大家都在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自下而上，第一，会产生合法性下沉，合法性都跑到下面去了。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干吗要听你的，干吗要接受你的命令？第二，会产生制度的分化。因为如果制度建设都在地方进行，那么就会产生国家制度多样性的问题， 2017-11-04 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1．从开放的角度理解出路 2017-11-04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本放弃了自己的发言，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些解释往往政治性很强、革命性很强，但是学术性不强，解释不通。马克思告诉我们哲学的两大任务，一是解释世界，一是改造世界。我们的五四运动没有解释世界，解释不通，就想改造世界。没有解释通的行动派，想要改造世界，结果越改越乱。 2017-11-04 比如说阶级，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找不到马克思所说的阶级——马克思说阶级是工业化的结果，那么中国现在的状况倒真有点类似于马克思口中所说的阶级——但是阶层概念是有的，中国是农业社会，有士农工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士农工商（阶层）是以政治身份来定义的。只要你自己意识到自己所用的阶级概念在中国是何种情况，也是可以用的。 4．改革不可能完全理性 2017-11-04 无改革，高发展，不稳定 5．“中国模式”的概念尚未清晰 2017-11-04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好多东西只能说是改革模式和政策模式 6．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国家和社会 2017-11-04 现在很多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都在移民。 2017-11-04 如果一个国家不保护好自己的社会，不能保护这些中产阶级，不能对这些民营企业家以诚相待的话，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因为他们的退出对转型是不利的。这还是跟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有关系。 2017-11-04 所以从西方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否则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西方资本主义没有毁灭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保护。 2017-11-04 社会科学中有三个人的书是必须读的，对西方学者也一样，马克思、涂尔干（E．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我是强调普世价值的，社会就是社会，有基本的共性。 1．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2017-11-04 共产党以前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组织。现在光靠组织的力量，淡化意识形态，这样很难持续。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2017-11-04 中国目前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没有钱，而是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就是因为穷人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 1．十七大是个新起点 2017-11-05 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民主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其中报告明确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宪政民主则表达于报告对法治和法律至高无上性的强调。党内民主对党内来说是一种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权力产生和行使方式。人民民主有多种形式，主要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人民民主也可以称为社会民主。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或者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都必须在一个法治和法律的构架中，这就是宪政民主的内容。无论是执政党本身还是其他社会行动者，都必须在宪政的构架内行使自身的权利和权力。 2．实际上的行为联邦制 2017-11-05 我曾经论述过，以民主政治为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制度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一旦民主政治发生，这类制度就很难得到建立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建立。 第二类制度在民主政治发生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变化。 第三类制度则必须发生在民主化之后。 4．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 2017-11-05 如果说在经济改革阶段，政府的权力主要建立在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改革阶段，这个权力基础转移到主要向社会提供政府服务。就是说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 1．中国特色的暴力生成机制 2017-11-05 如果只是以上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虽然会面临目前的许多问题，例如高自杀率、精神疾病多发、人际关系淡漠以及普遍的社会压力，但也许还不会如今天这样面对社会暴力快速蔓延的局面，尤其是“社会化”的暴力。当前的社会暴力更多直接源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社会秩序某些道德“底线”的失守。这背后更深远的因素，就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2017-11-05 这种追求交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模式，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强化了社会转型中各种“压力”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系社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基，从而直接导致社会的暴力控制机能失效。 2017-11-05 在这一点上说中国社会变迁基本上是“经济驱动型社会”，是毫不为过的。社会基本上被拖着向前走。这也使中国有别于西方许多“社会驱动型”（例如新教驱动下的西北欧资本主义发展）或者经济社会发展较同步的东亚国家。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方，随着社会关系的市场化，社会保护机制也随之出现。教会等组织在市场化的早期扮演了保护社会的角色，而后来更多的社会保护功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主要表现为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福利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在大力促使社会关系市场化的同时没有有效的作为来提供社会保护。在亲民和亲商之间，各级政府选择的是后者。 2017-11-05 社会暴力化的另一个主要机制是公权力的工具化。 2017-11-05 维护公平正义的公权力一旦失去规制，本来就存在于转型社会的各种“社会病”也就必然日趋严重。现在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心态、投机主义、暴力倾向、依附权贵、虚无主义等社会取向和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源头正是权力偏离了公平正义，导致国家和社会规制能力的双重减弱。在极端的情况下，公权力的暴力还会引发个人直接针对公权力的暴力寻仇。在“躲猫猫”、“喝水死”、“自焚抗拆”和袭击警察、法官的事件之间，看似毫不相关，但实际上两种暴力行为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2017-11-05 一些社会成员把那些对公权力实施暴力的犯人视为英雄，可见社会和公权力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和矛盾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 2017-11-05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近十年前，中国社会抑制暴力行为的自发机制，就是源于人们对共同体生活的一些基本道德准则，例如在与人交往时，要求将心比心，要讲“情理”，要“有所不为”，要有“不忍之心”，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所欲为。 2．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2017-11-05 3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没有“改革”的“发展”，必然是极不均衡的、自我击败式（Self-Defeat）的发展。从当下来看，通过社会改革及其配套的体制改革促发展，是中国逐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魔咒的唯一方案。而社会暴力的滋生，则应该成为社会改革全面展开和深化的动力。 1．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2017-11-05 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 2．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2017-11-05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 3．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2017-11-05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 2017-11-05 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 2017-11-05 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 4．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2017-11-05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2017-11-05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 2017-11-05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 2．“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2017-11-05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就解体了。解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人口流动了，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农村的衰败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2017-11-05 在西方，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是站在社会共同体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产生的恶性影响。 2．精读中国 2017-11-05 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同时，郑永年十分不认同近来国内外过分赞誉的说法，“中国的问题在内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内有些人称中国要追求国际领导权，他不惜提高调门，直斥他们是头脑发热，“现在追求国际领导权，是没用的，只能满足空虚的民族主义感觉”…… 1．改革亮点在于解决基层政府内耗 2017-11-05 国内基层政府尤其是县（市）这一级，党委是一套体系，政府是一套体系。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中有些部门设置重叠，往往容易导致政令不畅、相互扯皮和效率低下。另外，就是党政部门压缩至16个。据我了解，这样的改革力度，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4．广东特点是强政府、强社会 2017-11-05 强政府、强社会的核心有两点：一是政府放权，把不该集中的权力放给社会，给社会一定的生长空间；二是在此开放的基础上，政府要重点监管社会。顺德改革中的做法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路和价值。 1．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2017-11-05 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但美国到处去推行民主和自由，都是失败的，例如到阿富汗、到伊拉克去建立民主。把自己的价值观一厢情愿地强加给别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2．实现领导潜能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 2017-11-05 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会面临的情况是：具有国际责任，但没有国际领导权。 3．如何学习新加坡 2017-11-05 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2017-11-05 人民行动党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与中共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 2017-11-05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尽管它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后来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某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这就解决了很多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一些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1．中国政治改革及其方向 2017-11-05 政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太一样。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干部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等。政治改革，至少在学术层面上，尤其在西方学者眼里，被看作是民主化，或主要是民主化。 2．中国的国际责任 2017-11-05 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必须要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客观使然。 2017-11-05 另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2017-11-05 首先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就很难对世界负责。 1．新加坡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 2017-11-05 今天，发达国家的民主着重的不是做蛋糕，而是分蛋糕；到了发展中国家，蛋糕还没做大，各个党派就忙着抢蛋糕去了，这产生了无穷的冲突。新加坡的民主，是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分好蛋糕。 2．优质民主需要有意识的制度创新 2017-11-05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2017-11-05 第二，经济发展带来教育扩展，公民素质提高。 2017-11-05 第三，法制健全。 2017-11-05 集选区制度 2017-11-05 国家投票率只有30％多，这意味着领导人是30％多的公民决定的，这是民主吗？ 2017-11-05 所有西方民主理论都认为，公民素质是民主运行良好的前提条件。 3．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 2017-11-05 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2017-11-05 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当然，这有很多因素，但很重要的是，人民行动党是向社会开放的，所有的社会精英，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做得出色，都有可能被人民行动党吸纳进入政府。新加坡是真正的精英制度，人民行动党选拔人才也是很严格的，光会说好话，或者光会骂的人都是不行的，只有能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人才会得到重用。任何政党都希望自己是一党独大，但关键是怎么在合法的框架内做得到。人民行动党是开放的一党独大。 2017-11-05 高薪养廉也是被很多人误读的新加坡经验。新加坡的官员廉洁是靠很多机制保障的，高薪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新加坡实行官员高薪，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官员工资货币化，部长除了薪水，没有其他特殊福利，自己开车，自己出钱买房子。第二是以高薪从企业界吸引人才。但就像美国社会难以接受企业高管过高的薪水一样，近年来新加坡的部长高薪也引起新加坡人的一些批评。

发自我的小米手机